

新史学 & 多元对话系列

街头文化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
与地方政治，1870—1930

王笛 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街头文化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
与地方政治，1870—1930

王笛 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著;李德英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ISBN 7-300-07059-0

I.街…

II.①王…②李…

III.城市社会学—研究—成都市—1870~1930

IV.①C912.81②D67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006 号



新史学 & 多元对话系列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王笛 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8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27.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3 000

定 价 33.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文版自序

本书英文版是200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虽然问世刚刚一年多，欧美学界便已经发表了不少书评，包括《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加拿大历史学刊》(*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宗教的社会科学档案》(*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对本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学者的积极评论当然是对我努力探索的鼓励和奖赏，但也有持保留态度的，如《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的一篇书评虽然指出：“在过去十年，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中一些被忽视的问题的探索有了稳步发展。王笛对内陆省份四川成都的研究便是这个令人鼓舞的新趋势的最新成果之一。本书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力图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去揭示这一时期的城市转型。”但这篇评论同时也认为“王笛给予了成都街头文化一个浪漫的图景”，并指出“王笛为成都失去传统的街头文化而惋惜，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所失去的世界是否像王笛所描绘的那么迷人”。¹一本书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是十分正常的，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我以为学界予以重视，便是极大的成功。现在中译本即将出版，作为本书作者，当然希望也能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批评，这也是我所期待的。

其实，虽然我在本书讨论了传统城市的社区自治和自我控制，但并未描

绘一个“浪漫的图景”，因为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这是一个既有“和谐”亦存在阶级、族群隔阂和冲突的社会（见本书第六章）。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平洋事务》的这位评论者的确体会到了我书中流露的一种情绪。虽然本书是研究过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但我却有着现实的关怀。成都像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的面貌更加“现代化”了，从林立高楼到辉煌广场，从豪华饭店、酒楼、美国快餐连锁店到超大广告显示屏幕，白天到处是熙熙攘攘，晚上是灯红酒绿。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各种新式住宅如雨后春笋，从拔地而起的高楼到美国式花园洋房。就在这一派繁荣的背后，一个个古代的城市就在我们的眼前一天天消失了。现在，我们从南到北旅行，无论是大都市还小县城，格局几乎是大同小异，中国城市过去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形成的各自的城市外观和特点，幸存无多或几乎不复存在。尽管一些城市象征性地保留了一点儿旧城、旧街和旧建筑，但在宽阔大道和繁华高楼的衬托下，无非是不和谐的点缀而已。当我参观日本奈良、京都和法国巴黎、里昂等城市时，那些几百年前的古朴街巷和社区仍然保留完好，在里昂一些居民仍然住在15—16世纪的石头房子里。那些旧城和古建筑可以说是这些国家最宝贵的遗产。甚至在我工作的美国得克萨斯的大学城（College Station）附近，若干19世纪中后期修铁路时留下的铁皮或木板破房子，现在也被仔细地维修，列为“历史区”（historical district），加以认真保护。我经常在遐想，如果成都城市还保留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格局（尽管民国时期遭受到破坏已经不小），只是在周边另筑新城，那么成都可以说不亚于京都、奈良的旅游胜地。但可惜的是，这已经成为永远的梦。我只好通过这本书从一个侧面来重构这个已经消失的城市，来寄托对这个古都的怀念。

在这个研究中，我没有对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化的城市重建抒写更多的溢美之词。其实现代化带给人们的积极结果所论甚多。²我于199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001年再版，台湾五南图书2002年繁体版）对现代化也是赞誉有加，无须

我再费笔墨。本书的考察角度与此前的研究成果颇为不同，我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另外，过去有关社会变化的研究总是以精英为出发点，那么换一个角度，即从民众的角度来观察现代化和城市变革，也是十分必要的。本书是以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家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我们对腹地城市日常生活仍知之甚少。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来进一步拓宽和深入我们对中国城市史和文化史的理解。这个研究以“街头文化”作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然而当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时，便引起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随后在革命运动中，民众又以街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中，民众和精英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组织自卫活动捍卫他们的生存，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在中文版即将出版之即，想借此机会谈谈有关本研究写作的一些思考和片断回忆，或许这些思考和片断回忆可以对读者理解本书有所帮助。另外，对本书的翻译本也要作一些必要的交待。

叙事和用语

在目前的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无非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分析能力，他们能把读者引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发现如此简单问题的后面竟然埋藏着这么复杂的玄机。这种方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话语分析”（discourse），这个倾向也逐渐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学术领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这个倾向可以从那些“后现代”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但这些作品一般是写给在“象牙塔”中的专家看的，其所用的许多复杂理论和术语经常使普通读者如堕五里雾中，以至迷失了方向。另一种倾向是力图把复杂的问

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不仅使本领域的专家,而且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因此持这个倾向的史家主要采用的是“叙事”(narrative)的方法。如果说“话语分析”是把读者置于所分析“事件”之外,观看作者怎样熟练地把一个整体原子化,从而各个击破,使观者看到了从事物外面所看不到的“精妙”的内部,那么“叙事”方法则是力图把读者引导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可以说是把这种方法用到了极致的一位历史学家。

无须解释,这两种方法各具优劣。据我的观察,虽然“话语分析”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但美国历史学——无论是美国史、欧洲史还是东亚史——仍然是“叙事”方法居主流地位。从我个人的研究来讲,显然接近后一种方法,这当然与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我写作这本书之初,我就想使本书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虽然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我竭力使其具有可读性,使读者从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去体会我试图表达的东西。从一定程度来讲,我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³

在西方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有些词经常出现,但在中文中却缺乏对应词,因此这些词在英文中很容易理解,但翻译成中文则有可能产生歧义,如本书经常提到的“late imperial”(或 late imperial China)、“pre-modern”、“early modern”以及“elite”等。“late imperial China”在国内经常被错误地翻译成“晚清”,而实际上指的是从宋代到清末这样一个漫长时期,在本书中一般翻译为“晚期中华帝国”,尽管这是一个有点儿西化的表达。“pre-modern”直译中文是“前现代”,而这在中文中很容易引起歧义。这里的所谓“前现代”,是“现代(或近代)之前”,是指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现代”之前的历史,有“传统”、“过去”、“古代”之意,但又不完全相同。⁴本书的翻译则根据具体语境而定。而“early modern”在英文中也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表达,是指“早期近代”或“近代早期”,在中国史研究中一般是指

18—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中文翻译也只好根据内容和上下文而定。

“精英”(elite)在本书中经常出现，虽然我在英文版的导论中对此有解释，但有必要在此多说几句。在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elite”是一个常用词，该词在中文中没有完全对应词，一般翻译为“精英”。目前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著作中也常用“菁英”。但“elite”一词的范围远比“精英”广泛得多，它包括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大中小地主以及其他全部在地方有财富、有权力、有影响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哪怕他们的财富、权力、影响或教育也许很有限）。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中文词来表达的情况下，这里姑且译做“精英”，但应该注意这里的“精英”与我们经常理解的政治和思想精英分子有极大区别。

本书重点研究的是“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而没有讨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因为这并不是本书的出发点，但或许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一个个案思考。如果说J.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public sphere主要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⁵我在本书中主要考察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城市中人们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研究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是怎样从事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这种日常生活是怎样与地方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本书虽然没有直接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仍然是要解决“物质”的公共空间是怎样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空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哈贝马斯public sphere的概念，而采用歧义较少的“公”(public)——这个在中国存在已久——的概念，与英文中的“public”一词相对应，仍然可以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和语境中进行比较和交流。⁶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张信在其书评中指出：“《街头文化》是在这场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成书的。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一再考虑了有关方面的问题，最终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的城市社会，即从公共空间的形成、运作和发展的角度，于是找出了城市文化变更之关键。城市文化是由各阶层特别是市民百姓所创造和促成的，而街头文化正是

城市文化之最重要一部分,从这一点上来说,《街头文化》是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修正,而这一修正将人们的着眼点移到市民阶层上来了。笔者认为,这是该书的最大贡献。”至于他的评价是否恰当,还是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这里顺便交待一下关于资料的使用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本书导言中作了系统阐述)。我在不少地方做过关于街头文化研究的学术报告,每次总有人问我依赖的是什么资料,因为这是如何研究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所面临的困难。的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描述,基本上都不是由民众自己来叙述的,而是由精英来记录的,也就是说经过了精英的过滤。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大众和大众文化基本上是透过精英的眼睛,我们在研究它们时便不可避免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下层民众是否能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能不能代表他们自己?微观历史的代表人物 C. 吉兹伯格 (Carlo Ginzburg) 写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中提出,在所记载的资料中,下层民众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全是由记录人来写的。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资料,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实际上是已经被扭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声音,大众文化也是强加在下层民众身上的文化。因而研究下层人民的学者 G. 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提出了到底下层民众能不能讲话,发出自己声音的疑问。⁸但是通过我自己的研究,我认为他们是可以讲话的,他们是有声音的,但这取决于从怎样一个角度去使用这些记录下来的资料。

在作研究的时候,用什么口气来描述对象是很重要的。⁹这就是说,所描述的对象本身“是”这样的呢,还是所描述的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头脑所“反映”出的面貌。另外,我们在研究下层民众的大众文化的时候,感觉很难找到详细和具体的描述,因为精英并没有或不屑对它们浪费笔墨,所以它们所涉及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大多是比较抽象的批评。然而在研究下层民众的时候常常需要很具体的描述,那么怎样去寻找,哪里去寻找?西方已有学者开始把眼光放到文学的资料上,比如明清以来的地方谚语、民间文学、地方戏曲以及诗词等,都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很鄙

视文学资料，认为它们不可靠，因为经过了人们的想象和再创造。但是我认为，关键在于使用文学资料的时候，采用怎样的方法。例如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竹枝词，这些竹枝词是由成都地方文人创作的，记录了他们所见到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比如民众怎样在街头从事商业、谋生、人际交往、庆典等活动。在运用这些资料时，我并不宣称这便是真正的、准确的、大众的日常生活记录，而是反复强调这是这些精英所看到和理解的大众、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从中探索精英对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态度以及演变。因此在研究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时，我们完全可以在资料问题上扩展我们的视野，并换一个角度来考察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视觉资料为我们研究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此本书尽可能地收入了不少照片、漫画以及民俗风情画。这些视觉资料可以起到“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效果。虽然我们在使用文字资料时应该尽量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提供自己的解释，避免“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懒汉”式的研究方式，但本书所提供的这些视觉资料，都可以与文字分析相印证，从而加强我们对街头文化的理解。本书英文本共收入 59 幅插图，这个中文本又增加了 54 幅，总共 113 幅插图。另外，我又加入了几幅我收集的成都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老地图，放在正文之前以作为读者参考。

宏观与微观

我也想趁此机会谈谈我这些年来研究历史方法和史学观的一些转变。我在 1989 年完成，于 199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是对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的系统研究，涉及生态、人口、耕地、城市网络、贸易、经济结构、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区域性的宏观研究。从这个十多年前的研究中，读者可以明显看到我所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以布莱克的《现代化动

力：一个比较研究》使我获益匪浅。¹⁰在年鉴学派影响下，那本书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从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

这里应该说明，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在那本书中我采用的是“近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近代化视为从传统到现代化中间的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点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化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该项研究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¹¹

由于这样的构想，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正是在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从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之说，到马克思“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之形容，还有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以及中国史家“闭关自守”之论证，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¹²然而在该书的论述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证明即使是在长江上游这个中国相对封闭的区域，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社会从未停止过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当我在进行该项研究时，主观上并未把“停滞论”作为自己所要论辩的对象，而且该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走向近代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因而把

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的评价。换句话说,该项研究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的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在该书中语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话语”(discourse)。例如在讨论大众信仰、民风民俗时,所使用的“迷信”、“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都是当时地方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作认真辨析。

《街头文化》的英文版是2003年出版的,距《跨出封闭的世界》的出版已经是整整十年,它反映了我的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极大的转变。¹³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的变化的话,那么《街头文化》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跨出封闭的世界》也观察了普通民众,但并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注重传统的价值,并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人们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是怎样接受和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的。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注重“变化”(changes),那么《街头文化》虽然也研究变化,然而更强调“持续性”(continuity)。我的研究范围也大大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城市,从社会的各方面聚焦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从两百多年漫长的清代限定到20世纪前后六十年的历史。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街头文化”这个课题是怎样形成的。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论文之前,系里要求每个博士生必须提交一篇在原始资料基础上的研究论文,并在系里举办的讨论会上宣读和答辩。在选题的时候,开始我打算写晚清成都的改良人物傅崇矩,从他的经历和思想来观察社会日常生活

和文化,通过他的眼睛来看晚清的城市社会。在晚清,精英人物大部分关注的都是很大的问题,如国家政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弊病问题、专制问题,还有西学东渐和西方影响问题。但傅崇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非常注意下层民众的问题。他作了一个社会调查,编成了八卷本的《成都通览》,非常详细,犹如晚清成都的百科全书。他还创办白话文报纸。这些都反映了地方知识分子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的观察。当这个题目深入进去后,我发现收集的资料涉及很广,我的触角延伸到档案、游记、日记、报刊以及文学资料,包括诗歌和小说,其中有不少描述了下层群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包括他们的商业、娱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决定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观察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虽然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把我的研究局限在成都这个比较具体的区域。

本书的英文题目是“Street Culture”(街头文化),这个题目的形成带有某种偶然性。在我1998年题为“Street Culture”的论文发表之前,¹⁴可以说英语世界并没有这个用法,尽管当时“urban culture”(城市文化)、“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mass culture”(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庶民文化)等使用十分普遍。记得1995年在草拟论文提纲时,我的最初题目是“Popular Culture on the Street”,直译便是“街头上大众文化”。但在论证这个题目时,有时为方便起见,行文中有时也用“street culture”。不想我的导师罗威廉在审读这个报告时,对“street culture”这个组合十分欣赏,建议以此作为题目,更加简洁醒目。因此,这个组合虽然是我在偶然中所造,但却是罗威廉帮我提炼而成的。

这个更加限定的研究范围,使我能集中深入考察和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关系是什么性质?

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城市十分重要，但仍缺乏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理解。

《街头文化》完成后，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完成关于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两卷本专著上，其中第一卷已大致完成。本书对茶馆问题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不少问题，而我关于茶馆的专著则把许多已经提出的问题深入化、具体化和微观化。这个课题使我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从整个成都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缩小到茶馆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去探索整个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变化的，并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观察那个大的世界的变迁。由于空间范围的限定，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成为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个关于茶馆的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微观历史”（microhistory）。“微观历史”虽然在西方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发展，¹⁵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这除了史学方法的问题外，还因为对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研究缺乏系统的资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像欧洲教会档案、宗教裁判所那么大量、系统和完整的记录。虽然我并未能克服这种资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从挖掘档案到实地调查——也使我能够深入到茶馆的内部，去探索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微观世界。

寻找大卫·格拉汉姆

大卫·格拉汉姆是谁？这本书与他有何关系？为什么要寻找他？这个在本书英文版出版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值得在此作个交待。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规定（其他出版社亦有类似的规则），在交最后定稿给出版社的同时，必须填写“版权许可一览表”，以证明书中所征引的受版权保护的资料是获得了版权许可的，包括书中使用的照片和图片等。例如关于图片的一览表包括：图片编号、题目、来源、版权申请寄出和收到时间、版权费等。本书英

文版共使用了 59 幅插图, 我将所有版权问题在表中都作了相应的交待, 自认为不会有问题。但不想在 2002 年 7 月 31 日收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编辑助理卡门的电子邮件, 告诉我出版社的版权审查部门发现, 本书中的三幅图取自大卫·格拉汉姆 (David Crockett Graham) 1927 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四川的宗教》,¹⁶ 博士论文的资料只有在 1923 年之前 (即八十年前) 的才可以自由使用。因此这些图片必须得到版权许可, 否则只好从书中抽出。

虽然只有三幅图, 但它们对我要论证的主题却非常重要, 它们都是大卫·格拉汉姆 1916 年至 1926 年在四川作田野调查时收集的。其中一幅图是一对方形门联, 从右到左写着“一本万利”四个大字, 每字的上方用小楷写诗一句, 联在一起即: “春游芳草地, 夏赏采荷池, 秋饮黄花酒, 冬吟白雪诗。”该诗含春夏秋冬四字, 虽然是大白话, 却十分隽永, 意境美妙 (见本书插图 2-23)。另一幅图为“灶神”, 图中有“灶公”、“灶婆”和各种人物和动物, 还有一副对联, 正中是“奏善堂”, 上下联为: “人间司命王, 天上耳目神。”虽然画得粗糙、笨拙, 但非常有趣, 是大众所喜欢的典型风俗画 (见本书插图 2-26)。第三幅图为“门神”, 为“唐代胡帅”, 身着盔甲, 手提节棒, 威风凛凛 (见本书插图 2-27 左幅)。这三幅画都是表现大众文化非常生动的视觉资料, 过去沿街的两边铺面的门上都贴有门联门神, 是展示这种大众文化的最好场所。

其中有趣的是那幅门神, 当把其与我 1997 年在成都购得的一张门神相较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幅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沉睡了七十多年, 而另一幅却是成都民间艺人新近制作的, 它们在截然不同的时代出世, 而且处在太平洋两边的不同世界, 可以说彼此间没有如何直接的联系, 但是它们真像一对孪生兄弟, 除了细部有点儿差别外, 姿态外表竟然几乎是一样的! 从 1916 年 (也可能稍后一些) 这幅画到大卫·格拉汉姆的手中后, 中国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阶段, 中间还出现了若干次反大众文化的运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良、革命和现代化运动是

如此强烈地冲击着大众文化，但大众文化却有这样惊人的生命力。不但人们今天继续绘制、张贴门神，而且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竟然也如此相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在本书强调了大众文化的持续性（continuity），虽然它看起来是弱者，总是被国家权力和精英所征服，被正统文化和精英文化所打击和排挤，但它顽强地生存下来。过去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强调变化，考察的是在西方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但人们忽略了文化是最根深蒂固的因素。其实，有时大众文化从表面上看是改变了，但骨子里仍然是传统的。

因此，如果把这三幅图抽出的话，那将是十分可惜的。但问题是我到哪里去得到版权许可？这是一篇未刊博士论文，年代久远，到哪里去找作者？而且从年代来看，作者多半已经去世，寻找其家属恐怕就更为困难。说实话，对这么老的资料，在哪里申请版权，我也是一无所知。8月4日我给卡门发了电邮，询问具体办法。卡门马上回信，建议与芝加哥大学联系，一是弄清楚20年代的博士论文，是作者还是学校拥有版权；二是看学校是否保存有关于作者或家属的联系办法。我默默祝愿芝加哥大学拥有版权，这样可向学校申请，问题就将迎刃而解。我立即给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办公室打电话，但回答十分令人失望，他们告知作者持有版权。这样只好寄希望于学校能提供关于作者的联系办法，我随即打电话到芝加哥大学校友会，但被告知由于年代久远，他们也没有任何有关信息。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下笨工夫，从美国各图书馆的资料库去寻找有关作者的蛛丝马迹，例如大卫·格拉汉姆可能出版的书或文章等。幸好互联网使我的这种计划成为可能，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有任何斩获。经过一番努力，我还真的发现了大卫·格拉汉姆的近三十种其他作品，有的是已印行的，有的是存于博物馆的手稿，有的发表在杂志上，大多与四川有关，内容涉及大众宗教、风俗、民歌、方言、考古、少数民族等。而且有若干发表在具有很高声望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会刊上。我这才意识到，我寻找的这位大卫·格拉汉姆是一位非凡的学者，其兴

趣和知识是如此的广泛，而且是如此多产。而且令人惭愧的是，我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四川的学者，对他竟然一无所知，同时也为这样一位对四川宗教文化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美国人及其著作被默默无闻地埋没而深感遗憾！

但不幸的是，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30—40年代，从中无法得到作者的联系方式。但令人鼓舞的是，我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的档案一分部，在编号第7006号的亚历山大·威特莫尔（Alexander Wetmore）收藏中，发现了大卫·格拉汉姆与威特莫尔大量的通信，时间从1943年到1974年。威特莫尔从1925年起任史密森学会副会长，负责国家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和国家动物园。他似乎对古鸟类和鸟化石学特别感兴趣，留下了大量关于各国古鸟类和鸟化石学的通信记录，而大卫·格拉汉姆曾在中国西部为美国国家博物馆（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收集自然标本多年，因此他们之间有不少信件往来。这些通信记录表明，从1919年夏开始之后二十年间，大卫·格拉汉姆在史密森学会的资助下，曾在四川进行了十四次收集考察。

我得到这个线索后非常兴奋，这表明史密森学会与大卫·格拉汉姆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史密森学会很可能会找到有关大卫·格拉汉姆及其家属的信息。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到史密森学会档案部，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有关人员告诉我，大卫·格拉汉姆与威特莫尔的信件是70年代在大卫·格拉汉姆去世后其家属捐献的，档案部没有保存任何其家属的联系记录。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点儿线索又断了。

我只好借助于互联网，继续搜寻有关大卫·格拉汉姆的蛛丝马迹，虽然其希望犹如大海捞针一般。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竟然在出版于田纳西州的《烟山历史学会通讯》（*Smoky Mountain Historical Society*）第26卷第1期（2000年春季号）上，发现了一则小消息，一位名叫琼·格拉汉姆·布朗的人（Jean Graham Brown）给《通讯》写信说，她对莎拉·欧格勒（Sarah Ogle）的家史感兴趣，因为莎拉·欧格勒在结婚以后，便搬到了阿肯色州的格林·弗勒斯特（Green Forest），那“是我父亲大卫·克罗克特·格拉汉姆